



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

國際漢學研究通訊

Newsletter for
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

第三期
2011.6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

國際漢學研究通訊

Newsletter for
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

第三期

2011. 6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國際漢學研究通訊. 第3期/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. —北京: 北京大學出版社, 2011.7

ISBN 978-7-301-19260-3

I. 國… II. 北… III. 漢學－研究－世界－文集 IV. K207.8-53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1)第140805號

書名：國際漢學研究通訊(第三期)

著作責任者：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

責任編輯：武芳 翁雯婧

標準書號：ISBN 978-7-301-19260-3/K·0792

出版發行：北京大學出版社

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

網址：<http://www.pup.cn>

電話：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
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

電子郵箱：dianjiwenhua@163.com

印刷者：三河市北燕印裝有限公司

經銷者：新華書店

720毫米×1020毫米 16開本 36.5印張 514千字

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價：98.00元

未經許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。

版權所有，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：010-62752024

電子郵件：fd@pup.pku.edu.cn

《國際漢學研究通訊》
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

編輯委員會

主任 榮新江

委員(按漢語拼音音序排名):

白謙慎(美國波士頓大學)

程郁綴(北京大學)

程章燦(南京大學)

傅剛(北京大學)

寇致銘(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)

李零(北京大學)

李慶(日本金澤大學)

劉玉才(北京大學)

馬辛民(北京大學出版社)

潘建國(北京大學)

齊東方(北京大學)

橋本秀美(北京大學)

榮新江(北京大學)

商偉(美國哥倫比亞大學)

王博(北京大學)

汪濤(英國倫敦大學)

徐俊(中華書局)

楊繼東(美國密歇根大學)

袁行霈(北京大學)

張志清(中國國家圖書館)

趙超(中國社會科學院)

鄭吉雄(臺灣大學)

主編 劉玉才

目 錄

漢學論壇

中國詩學的特點與民族詩學的建立	袁行霈/3
江漢流域與東晉南朝文化(遺稿)	曹道衡/11
唐人眼中的杜甫:以《唐詩類選》為例	宇文所安 撰 卞東波 譯/24
漢籍的外傳與文明的對話	嚴紹璽/50

經典詮釋

論《易》傳對《易經》哲理的詮釋 ——辭例、易數、終始觀念	鄭吉雄/59
“四書”和“五經”在意大利的歷史和傳統	李集雅/80
試論《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》之語言藝術風格	金文京/91
“《紅樓夢》、《源氏物語》在現代中國與日本:媒體、性別與文化認同”研討會述評	熊 璜/108

文獻天地

日本宮內廳藏古寫本《文選》卷二研究	傅 剛/127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目
錄

中尊寺本金銀泥字《大唐西域記》的舊藏者

——明治時期日本古籍流出的一例個案研究

高田時雄/143

唐代東亞文學史文體意識接受初探

——以《文選》與《經國集》“賦”類為例

童 嶺/152

信史還是小說？

——《王陽明靖亂錄》及相關問題

李 廣/170

水戶《大日本史》編纂方針之確立與朱舜水

呂玉新/181

清代輸往日本漢籍的初步研究

周振鶴/196

“禮失而求諸野”

——從自身研究經歷看和刻本漢籍的價值

王瑞來/215

西學漢籍在東亞的傳播研究

張西平/238

漢學人物

古斯塔夫·哈隆與劍橋漢學

朱玉麒/261

在論辯中進步

——田浩教授“美國漢學與漢學家”課程紀要

丁義玗/311

他鄉多宛委，幸得有心人

——高田時雄教授“海外漢籍調查與研究”課程小記

黃 政/320

美籍華裔學者蔡宗齊的中西詩學研究

徐志嘯/326

研究綜覽

早期法國漢學研究四題

程章燦/339

日本研究中國古代小說概觀

丸山浩明/351

略談近年來日本學者有關中國古代石刻的研究情況

——《以唐代墓誌所在總合目錄》為例

趙 超/364

“詮釋、比較與建構：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”綜述 程中山/369

論著評介

Introduction to a Pictorial Record of the Qing Dynasty:

Qing Dynasty Architecture

Zhang Hongyang/379

《中國的世界性帝國：唐朝》評介

王 翔/384

評俄羅斯科學院首編《中國精神文化大典》

李明濱/395

2001—2010年國際漢學類著作中文出版概況

徐奉先/402

基地紀事

“老子：文獻與思想”國際學術討論會紀要

431

“國際漢學與漢籍流傳”學術研討會紀要

433

古籍形制·圖像·文本

——中日書籍史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紀要

439

《國際漢學研究通訊》編輯委員會首次工作會議紀要

442

國際漢學系列講座紀要(2010.9—2011.3)

445

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大事記(2010.9—2011.3)

458

征稿啓事

漢學論壇

中國詩學的特點與民族詩學的建立*

袁行霈

—

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。中國詩歌的歷史源遠流長，《詩經》中的篇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紀，與《荷馬史詩》或印度史詩《羅摩衍那》相比，都是早的^①。而且中國的詩歌傳統，從《詩經》開始，從來沒有中斷過。詩歌對其他文學體裁有深遠的影響。駢文是在詩歌的影響下形成的；唐傳奇是詩化的小說；中國的戲曲是歌劇，曲詞就是詩。夸大一點說，中國文學簡直就是詩化的文學！

中國作為一個詩的國度，不僅詩歌創作十分繁榮，詩學也很繁榮。早在《尚書》中就有“詩言志”的說法，這奠定了中國詩學的基礎。孔子重視溫柔敦厚的“詩教”，又有“興”、“觀”、“群”、“怨”之說，強調了詩歌的社會作用。孟子關於“以意逆志”、“知人論世”的說法，開啓了詩歌闡釋的方法論。《詩大序》所論“發乎情，止乎禮義”，將個人抒情與符合禮義兩方面統一起來。以上這些說法奠定了中國詩學的基礎，影響着後世詩學發展的道路。魏晉南北朝時期，諸如“文氣”、“緣情”、“風骨”、“體性”、“隱秀”、“自然”，以及“言”、“意”、

作者單位：北京大學中文系

* 本文初刊於北京大學中文系、香港大學中文系合編之《中國文學學報》創刊號（2010年12月）。

①《荷馬史詩》在公元前6世紀才被人用文字記錄下來，《羅摩衍那》成書於公元前3、4世紀至公元2世紀。

“象”三者關係的論述，在文學自覺的背景下，標誌着詩歌理論的成熟。從唐代直至清代，各種詩論層出不窮，如“意境”、“窮而後工”、“神韵”、“性靈”、“格調”等等，顯示了豐富多彩的面貌。以上種種足以證明，中國詩論是一筆十分寶貴的精神遺產。

中國的詩學具有自己的特點，與西方詩學有明顯的區別。亞里士多德所謂“詩”並不限於詩歌，他的《詩學》是一部研究悲劇等藝術的美學著作。而中國的所謂“詩”原來專指“詩三百”而言。漢代“經學”里關於《詩經》的部分，後來或稱為“詩學”，但那是專指對《詩經》的研究，與此並列的還有“易學”、“春秋學”等等，與我們在這裡討論的詩學不完全一樣。大約在魏晉時期，詩已成為一種文體的名稱，如曹丕《典論·論文》所謂“詩賦欲麗”，陸機《文賦》所謂“詩緣情而綺靡”，其中的“詩”都是指文體而言。隨着詩歌體裁的發展，詩包括了四言、五言、七言和雜言的古近體詩。當詞興起之時，或稱曲子詞，或稱長短句，或稱詩餘，本來是不和詩相混的，後來也納入廣義的詩的範圍之內。然而在中國，“詩”的範圍始終沒有像亞里士多德所指的那樣廣泛。中國有不同於西方的詩的傳統，也有不同於西方的獨特的詩學。認真總結中國的詩學，既有助於理解中國的詩，也有助於豐富中國的文學理論，乃至世界的文學理論。

那麼，中國的詩學有哪些特點呢？

一、實踐性。所謂實踐性是說，詩學密切結合詩歌創作和詩歌鑑賞的實踐，既是創作活動和鑑賞活動的經驗總結，又是指導創作和鑑賞的。中國的詩學常常是就具體的詩人或詩歌加以評論，或者是評論其風格，或者是評論其構思，或者是評論其技巧，或者是評論其遣詞造句，或者是講述有關的本事，或者是講述其政治教化的意義，或者是講述有關的詩歌發展史。讀者只要熟悉作品或者有一些創作的經驗，就不難理解，但真正深入理解又不容易。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，中國詩學就其主要部分而言，是為了教人創作和鑑賞的。離開創作和鑑賞實踐的、思辨性很强的理論並不多。中國詩學雖有系統的理論，但缺少系統性很强的理論。最有系統性的就算《文心雕龍》了，它開了一個好頭，但後來沒有再出現這種著作。即便是《文心雕龍》也是密切結合創作和鑑賞實踐的，而且是用駢文的體裁寫的，駢文利於顯示作者的文

采而不利於發揮論證。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說劉勰也是將《文心雕龍》當成文學作品來寫的。實踐性是中國詩學的長處，而理論的不够發達則是其不足。中國詩學的不足之處，需要我們加以補充。研究中國詩學不能滿足於只介紹古人的說法，也不能硬是把古人的不很系統的理論說成是系統的理論。可以在介紹古人的說法之後，再結合古人創作和鑑賞的實踐活動由我們重新加以總結，提出我們今天的系統理論。

二、直觀性。所謂直觀的反面是推論和演繹，直觀是一種印象式的把握，更多地靠妙悟。在表述時往往略去思考的過程，跳躍式地直接端出結論。說一首詩好，並不作詳盡的分析，只是三言兩語點到為止，讀者也不習慣去看連篇累牘的評論，而是靠了那三言兩語的啓發，自己領悟其中的三昧。讀者的領悟可能和批評家的說法不完全相同，這也沒有關係。舉例來說，鍾嶸《詩品序》說：“五言居文詞之要，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”^①，什麼叫滋味？五言詩為什麼最有滋味？鍾嶸並沒有論證，其中的奧妙全憑讀者自己體會。再如皎然《詩式》說詩有“二要”：“要力全而不苦澀，要氣足而不怒張。”^②這的確是經驗之談，作詩的人會覺得他說得好，但什麼是力？什麼叫苦澀？什麼是氣？什麼叫怒張？力全和力不全有什麼界限？氣足和氣不足又怎樣區分？他都沒說。又如司空圖《二十四詩品》中有一品叫“沉着”，全文如下：“綠杉野屋，落日氣清。脫巾獨步，時聞鳥聲。鴻雁不來，之子遠行。所思不遠，若爲平生。海風碧雲，夜渚月明。如有佳語，大河前橫。”^③這段文字本身就是一首詩，從各個角度寫出沉着的種種表現，全憑讀者從中體會詩的沉着究竟是一種什麼况味。又如敖陶孫的《詩評》評古今名人詩曰：“謝康樂如東海揚帆，風日流麗。”“孟浩然如洞庭始波，木葉微脫。”^④沒讀過這些詩的人摸不到頭腦，讀過的人覺得說得好，但究竟說的是什麼意思則只能意會而不可言傳。可見中國詩學批評是一種啓示性的批評，研究它沒有悟性不行，太死板也不行，把直觀的感悟的印象式的語言轉換成思辨性很强的概念，或含義十分確定的理論，

^① 鍾嶸著，陳延杰注，《詩品注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1，2頁。

^② 皎然著，李壯鷺校注，《詩式校注》卷一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3，20頁。

^③ 司空圖，《二十四詩品》，何文煥輯《歷代詩話》本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，39頁。

^④ 魏慶之著，王仲聞點校，《詩人玉屑》卷二《臞翁詩評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，25頁。

要特別小心，很容易失去其原意，也失去了原有的生動活潑的水靈靈的好處。我們尤其不可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標準，看待中國這套詩學的話語，而視之為落後的東西，試圖簡單化地加以改造。詩學的落後與否，並不取決於話語體系，而是要看它與詩歌創作和鑑賞的關係，對詩歌創作和鑑賞所起到的作用。中國詩歌如此繁榮，中國的詩學是起到了很大作用的。由此看來，中國詩學的話語體系正是應該加以發揚光大，並作為精神財富向世界原原本本地加以介紹的。

三、趣味性。歐陽修的《六一詩話》是最早的一部詩話，他自稱寫這部詩話的目的是：“居士退居汝陰，而集以資閒談也。”^①原來是為閒談提供話題和數據的。因此，趣味性就成為十分必要的了。在中國的詩學資料里有不少趣聞，如賈島推敲撞上韓愈的故事^②，王安石修改“春風又綠(到、過、入、滿)江南岸”的故事^③等等，可以舉出許多。中國詩學當然有嚴肅的探討，甚至是激烈的辯論，也不乏劍拔弩張之勢。但趣味性的閒談畢竟是其一大特點，一種輕鬆的氣氛，一種讀者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的豁達態度，我自說我的，信不信由你——這是常見的中國詩學的氣度。

總結上面所說的特點，我們今天的所謂“詩學”，應當是指中國自古以來關於詩的論述，以及品評、鑑賞詩的一套中國特有的學問。

二

既然中國詩學具有不同於西方的特點，而且其傳統悠久而深厚，那麼就應當致力於民族詩學的建立，並用我們自己民族的詩學來梳理和闡釋中國的詩歌史。對此，我有以下幾點很不成熟的設想，姑且提出來向諸位請教：

一、從中國詩歌創作的實際出發，結合作品來理解各種詩歌理論的背景及其針對性，進而把握其真正的含義；而不是從概念到概念，脫離創作實踐作無端的演繹。這就要求研究詩學的人必須同時研究詩人、詩歌、詩體、格律和

① 歐陽修，《六一詩話》，《歷代詩話》本，264頁。

② 何光遠，《鑒誠錄》卷八《賈忤旨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9，58頁。

③ 洪邁，《容齋續筆》卷八《詩詞改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，317頁。

詩歌史。對詩人沒有深入的研究，對詩歌沒有藝術的領悟，對各種詩體的特點與格律沒有切實的把握，對詩歌史沒有系統的了解，就難以深入理解詩學理論。反過來說，研究詩歌史的人也應當研究詩學理論，不了解每個時期的詩學思想、詩學潮流，也不能深入理解詩歌創作。

中國詩學理論與詩歌創作並不是同步發展的。在詩歌創作的高潮期，詩學理論不一定繁榮；而在詩學繁榮的時期，詩歌創作的成就又不一定很大。詩學超前或滯後的現象都曾出現過。唐朝時詩歌達到繁榮昌盛的頂點，但唐朝的詩學理論却比較沉寂；明朝詩歌創作成就不高，但詩歌理論却很發達。這種狀況我們也不能不考慮。

二、應當放到文化的大背景下進行研究，尤其需要具備中國哲學史、宗教史、藝術史的修養。許多詩學理論的概念出自哲學家之手，而且是以其哲學思想為根基的，或者說是從其哲學思想引發出來的，其表述的方法也往往是哲學式的；還有許多詩學理論就包含在哲學理論當中，甚至將哲學的命題直接引入詩學。所以如果不了解中國哲學思想和哲學思考的方式，就很難深入了解中國的詩學。例如言意之辨，本是哲學命題，引入詩學成為深刻的詩學理論。“自然”本來也是哲學命題，而且是老莊特有的概念^①，引入詩學也成為深刻的詩學命題。研究這些詩學理論，不從哲學入手永遠也搞不清楚。

佛教作為一種異質文化傳入我國，所引起的震動之大，只有鴉片戰爭之後西學東漸的狂飆可以比擬。其影響波及思想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學、繪畫、建築、音樂、風俗等許多方面，波及從帝王到平民各個階層。以魏晉南北朝時期為例，佛教為文學營造了一種新的文化氛圍和文化土壤，中國的詩學當然也深受影響。慧遠在廬山與謝靈運、劉遺民、宗炳等許多文人都有很密切的關係。謝靈運是一位篤信佛教並懂梵文的文學家，他受竺道生影響撰《辨宗論》，應慧遠之請撰《佛影銘》，又撰《慧遠法師誄》、《曇隆法師誄》、《維摩詰經中十譬贊》。據慧皎《高僧傳》記載：謝靈運所著《十四音訓敘》，“條列梵漢，昭然可了，使文字有據焉”^②。《十四音訓敘》是他參加佛經的“改治”，向慧叡請教

^① “自然”二字不見於《論語》和《孟子》，是老莊哲學特有的範疇。參見拙文《陶淵明的哲學思考》有關論述，載於《陶淵明研究》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，3—12頁。

^② 翱慧皎著，湯用彤校注，《高僧傳》卷七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2，260頁。

後所撰。張野也是“學兼華梵”的文人^①。四聲的發現，與佛經翻譯有關。竟陵王蕭子良於齊武帝永明五年(487)在建康召集文士、名僧，討論佛儒，吟詩作文，並造經唄新聲。這件事對沈約等人開創永明體詩歌起了催化作用，而沈約本人也篤信佛教，精通內典。著名的文學理論著作《文心雕龍》的作者劉勰曾“依沙門僧佑，與之居處，積十餘年”^②。編撰《玉臺新咏》的徐陵與智者大師交往密切。從以上這段極其粗略的敘述中可以看出，佛教對魏晉南北朝文學和詩學的影響既廣且深，這恰恰是詩學繁榮的時期。其他如“境界”等廣泛用於詩學的一些概念，也是從佛經中借用的^③。我們如果從兩者的關係入手，是不是可以找到許多新的研究課題呢？我們如果熟諳內典，是不是可以對中國詩學產生一些新的看法呢？

中國的詩學理論和藝術理論也有許多相通的地方，詩論與書論、畫論、樂論等互相參照才能有新的開拓。就詩論與畫論的關係而言，就很值得深入研究。鍾嶸有《詩品》，謝赫有《古畫品錄》，二者所用的方法相似。繪畫上多有題詩，或者是畫家自己的詩，或者是收藏者、觀畫者的詩。題畫詩的數量很多，其中的佳作也很多，康熙《御定歷代題畫詩類》(陳邦彥編)一百二十卷，收詩8900多首。李白寫過《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》，杜甫寫過《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》，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。杜甫在這首詩里說：“尤工遠勢古莫比，咫尺應須論萬里。”“咫尺萬里”之說，是很好的畫論，也是很好的詩論。古代的畫論和詩論有許多相通之處，可以互相發明，例如提倡自然，推崇天趣，注重“氣韻”。中國的繪畫講究詩意，詩歌講究畫意，蘇軾所謂“味摩詰之詩，詩中有畫；觀摩詰之畫，畫中有詩”^④，已成為一句經典性的評論。

三、要了解中國詩學的特殊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。研究者的大忌是將古人現代化！具體地說，就是不顧古人本來的意思如何，用現代人的一些概念比附古人的思想。把古人沒有的東西強加給古人。特別是詩學中的一些概

① 佚名，《蓮社高賢傳·張野》，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1，13頁。

② 姚思廉，《梁書》卷五〇《文學下·劉勰傳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，710頁。

③ 如三國魏康僧鎧所譯《佛說無量壽經》卷上即云：“比丘白佛，斯義弘深，非我境界。”高楠順次郎等輯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第十二卷《寶積部下》，第360冊，大正一切經刊行會，1925，267頁。

④ 胡仔著，廖德明校點，《苕溪漁隱叢話前集》卷一五《王摩詰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62，97頁。

念，諸如“氣”、“骨”、“意境”、“興趣”，含義相當模糊，古人的用法很靈活，在不同的人筆下有不同的重點。我們當然希望有一種明確的解釋，但應特別注意別把我們自己的東西加到古人身上。我們可以採用古人的某一概念結合當時的創作實際加以新的闡發，以構建我們自己的理論，但應當說明這是我們自己借鑑了古人的理論而形成的自己的理論。

四、要把中國詩學放到世界文學的大格局中來研究。有了世界的眼光，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國詩學的特點，包括長處和短處，才能進一步融匯外國的經驗來發展我們民族的詩學理論。20世紀前期英美意象派的理論，間接地受到中國詩歌的影響，風靡一時。如果研究中國詩學的人對英美意象派有所研究，反觀中國詩歌和詩論，便會有更深的體會。

五、加強中國詩學史的研究。目前，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已經蔚為大觀。其中，詩學占有相當大的比重。在此基礎上，可以將詩學史作為文學批評史的一個分支進行專門研究，進而使之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。如上所述，中國詩學的數據十分豐富，而且很有特色，完全可以支撑起這個學科。中國詩學史的研究，要將詩論和詩史融合起來，用詩學的理論來闡述詩史的發展，用詩史的線索來闡述詩學的理論；要找出詩論和詩歌創作之間潛在的深層的聯繫，而不滿足於表面的糅合；要找出從詩歌創作（作為一種現象或存在）到詩歌理論（作為一種概念或範疇）之間的生長點，也就是蘊含在詩歌作品中的活潑潑的、可以提升為理論的創作經驗；要講出古人是如何從詩歌作品中提煉出理論，又如何將理論滲透到創作之中。例如“氣象”是從哪一類唐詩中（而不僅是前人的類似說法）提煉出來的？又如何影響着當時和後世的創作？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朝代分期，按照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發展的內在邏輯重新劃分時期，講出每個時期新增加的帶有標誌性的因素。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是多姿多彩的，一個時期可能有一種占主導地位的理論，一種占主導地位的創作傾向，我們既要找出主導的東西，也要呈現其豐富多彩的面貌。

詩學史的研究離不開文獻考訂，文獻考訂是研究工作的基礎，弄清事實這項工作本身就有重要的學術價值。在這方面我們已經取得許多成績，今後還要繼續努力。《二十四詩品》作者的考訂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。隨着新資

料的發現，如《孔子詩論》的發現，以及文化史研究的開展，考訂方法的進步，一定會出現更多新的成果。

六、詩學研究要貼近讀者大眾，引導大眾去欣賞詩歌，學習寫作詩歌，給大眾以美的啓示。我們有責任用理論性的語言把古代詩歌的美告訴讀者，有責任用美的語言把古代詩論的深邃告訴讀者，使他們感受我們自己曾經沉浸於其中的那種悅。詩學研究的繁榮不僅表現為論著的增多和水平的提高，也應當表現為廣大讀者對詩歌的接受與歡迎。上面說過，實踐性是中國詩學的一個特點，我們對中國詩學的研究成果也應具備這樣的品格。這方面的工作同樣具有學術價值，而且更具有現實意義，需要以高水平的研究為基礎才能做好。

中國古代詩學有一個根本的理念，就是將詩置於崇高的地位，認為詩對自然、社會、人生起到近乎神秘的作用。《詩大序》所謂“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”，就體現了這種理念。“詩三百”在漢代被尊為經，《離騷》在漢代也曾被稱為經，鍾嶸《詩品序》所謂“照燭三才，輝麗萬有”，也都表現了古人對詩的尊崇。我們今天建立民族的詩學，當然不可完全沿襲古人的觀念，但詩學的崇高地位仍然是應當確立的，這會使我們以一種虔敬的心情對待我們所從事的學術。

總之，中國詩學是伴隨着中國詩歌的繁榮而發展起來的，具有濃厚的中國特點。有一些概念恰恰是西方詩學中沒有的，如“意境”、“風神”、“氣象”、“風骨”、“興趣”、“神韻”等等。一些批評的方法，如以詩論詩（論詩絕句），詩話、詞話，以及品評、批點的體例，也值得西方注意。在借鑑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以重新審視中國詩學的同時，向西方介紹中國詩學，使之成為全人類的精神財富，是我們的一個努力方向。

目前已經進入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時代，中國能夠貢獻給世界的精神成果很多，但是世界對中國的了解相對來說還很不夠。我們要認真地整理古代詩學這份遺產，以高度的自信心加以弘揚，并介紹給世界。我相信，建立在輝煌而悠久的詩歌創作基礎上的中國詩學，一定能够在人類文明的天空中綻放出燦爛的光芒。我相信，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這次高端的研討會，一定能够推動中國詩學向前發展。